

Wild Mary

A Life of Mary Wesley

(英)帕特里克·曼汉姆·薛晓然 著

Patrick Marnham

潘源 译

绝代风华的英国皇家作家玛丽·威斯利

野
玛
丽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绝代风华的英国皇亲作家玛丽·威克利

野 玛 丽

Wild Mary

A Life of Mary Wesley

(英)帕特里克·曼汉姆 薛欣然 著

Patrick Maruham

潘源译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合同登记号：图字 19—2011—031 号
Copyright © Patrick Marnham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野玛丽：绝代风华的英国皇亲作家玛丽·威斯利 /
(英) 曼汉姆, 薛欣然著; 潘源译. --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14.8

书名原文: Wild Mary a life of Mary Wesley
ISBN 978-7-5360-7199-5

I. ①野… II. ①曼… ②薛… ③潘… III. ①威斯利
, M. (1912~2002) — 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63826号

出版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林宋瑜 揭莉琳 余佳娜
技术编辑：陈诗泳
装帧设计：梁丽辉

书 名	野玛丽：绝代风华的英国皇亲作家玛丽·威斯利 YE MALI: JUEDAIFENGHUA DE YINGGUO HUANGQIN ZUOJIA MALI · WEISIL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天鑫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工业大道南瑞宝路)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20 开
印 张	17 4 插页
字 数	280,000 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我这一代人常常都有和我一样的父母，他们希望女儿嫁给某一种人，过某一种生活。为了做那个社会中的好女儿，我很努力地试过了，但发现很无聊。因为在那个所谓的英国上流社会，只有婚姻才能为年轻的女子换来自己的地位和自由。女孩子在婚前必须与父母同住，没有金钱，没有工作和学历，除了对父母俯首帖耳，别无选择。她每周主要的工作就是在父母的安排下或是认同后的社交活动，而其中最主要的家庭责任就是不停地会见一大群年轻的男人，为她有朝一日接受一个求婚而做她的“人生作业”。

战争造就了酒鬼与情侣，扭曲了所有生存的价值观。

——玛丽·威斯利

玛丽·威斯利的小说诞生于 1980 年代，那是在欧洲“战后二十年那西方可敬社会”的青年文化时期之后。她以写作打破了她那一代人在战后的沉默和禁忌，每一部作品似乎都在告诉出生在五六十年的子辈，以及七八九十年代的孙辈们：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的生活与他们曾有着同样甚至更无畏的兴趣和激情。众多的女性读者被玛丽书中女主人公们吸引，开始认定那些不惜代价打破传统、按照自己的意愿取舍生活的女人们为她们的英雄。

——帕特里克·曼汉姆

中文版序

薛欣然

玛丽·威斯利是英国一位传奇女作家：70岁高龄出版第一部小说；90岁去世前完成十部经典，其中多部被选入中学英语课本、大学文学必读，以及拍成影视剧；她写作的九大主题均来自于她90年国事家史的见证：英国上流社会发家史，欧洲世界大战史，以及战后英语文学的演变史。其中：皇亲国戚中的荣辱叛逆，上流社会道德伦理的不堪一击，战争恐惧中性情的错落释放，等等，言无不尽！

第一次听说玛丽·威斯利，始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兼课，那时几乎对英国现代文学一无所知。之所以记住了这个名字，是因为来自英国外交部的学生告诉我：那是一位坦诚得惊人的作家，她的故事能揭开帷帐直上卧床；她的直率令人无措，采访问答皆无修辞着装。

在波斯肯纳庄园围墙外的公众眼中，“我们等同一群骚货”。战争中我一直为拥有各式各样的情人而感到内疚和不快乐……每个情人都很短暂，他们大多是很快上天拼死的大男孩。看着他们求生的眼神，听着他们谈论战死的恐惧，我不能不主动，他们应该在生时有机遇享受人爱和性爱……如果我是一个男人，人们会说“他拈花惹草”。但必须承认，我的拈花惹草，总体而言，其中爱怜大于情趣。但是，如果我从中感受到了作为人的愉悦，那么，我相信我的情人们也有同感。其实，我那时的生理所为是当今女孩在婚前所经历的常事，社会在一步步认可愉悦是人生很重要的生活质量，但是在我的青中年时代，那被视



为大逆不道。

然而，人类的“道”自古便被等级划分归类，而“理”则是被权贵们定义解释的。玛丽在其作品中直言不讳地描述了道貌岸然之流：

一个即将获得骑士勋章的高级文官却因强奸他最好朋友的妻子而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三辆揽胜越野车奔驰在威尔特郡的公路上，开车的是国会议员、行政总裁和外交官，三兄弟赶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他们的未来弟媳秘密堕胎；几个表兄弟在强奸了把他们当作英雄来崇拜的女孩之后，走上战场，准备为国捐躯。这些似乎都曾发生在每个过节每个历史阶段中，但人们把它们深藏在羞耻中，欺骗着后人。

玛丽·威斯利有3个儿子，分别来自她与3个男人在阶层、战争和信仰之中的结合，但他们从父母性情的聚集地出发却各奔东西，信仰生存分散在天涯海角。

玛丽长子的父亲是卡罗尔·斯温芬勋爵，他把当今王室的穷亲戚玛丽带回了仿佛属于她的金碧辉煌。卡罗尔是一位善良大度的极品男人，他谨慎地遵循着上流社会的潜规则，包容地旁观着玛丽在战争时期的“出格奉献”，慈爱地关怀着并非己出的儿子。那是爱德华七世留下的准则：只要妻子为授勋丈夫生出子嗣，丈夫就应该接受妻子的非婚生子。但是，二战的爆发，决裂了他们那同阶级却不同志向的婚姻。卡罗尔视战争为制造着帝王和恶魔的历史，是在为人类的是非决斗。而玛丽感受到的不是国仇家恨，而是人性在杀戮中的毁灭，年轻人在热血沸腾和恐惧无助中被送往生死未卜的战场，母亲们在为战争中失去的孩子撕心裂肺般地承受痛苦。她不愿意粉饰那个她所目睹经历的并非都是英雄和败类的战争，或是躲在那个硝烟的外衣下掩饰自我的追求，更不齿与皇亲国戚们一起在血腥中



为他们那裂变消亡的婚姻编织着遮羞布。

玛丽次子的父亲是海因茨·齐格勒，是布拉格的一位大学政治学教授，布拉格劳尤维茨庄园的长子。因父母被希特勒杀害，海因茨隐姓埋名加入英国皇家空军，转战南北立志复仇。海因茨阵亡后，捷克流亡政府的首脑延·马萨里克捶胸顿足：“太可惜了，我们是要任命他为外长的呀！”

海因茨在战时流亡英国后与玛丽相遇，两人一见钟情。海因茨的博学、幽默、善解人意令玛丽崇敬向往，也激发了玛丽对诗歌文学的兴趣。但她从不敢相信成为夫妻后海因茨还能忍受她的不学无术。

海因茨·齐格勒与英国朋友们在 20 世纪 30 年代时的讨论总是萦绕在玛丽的心头：英格兰是“一个谦和有礼的伟大世界，一个勇敢且谨慎地承担责任的民族，一个拥有没有被工业所摧毁和扭曲都市与乡村的国土，一个相信诸如暴力、残酷、炫耀、贪婪这样的行为是不良行径，故而不为之的世界。——世界正在魔变：可信的美德被证明只是幻觉……有钱后，人们的精神和灵魂开始变得贫穷”。

么子的父亲是艾瑞克·希普曼，英国著名教育学家奥托·希普曼的小儿子，1945 年至 1954 年的英格兰银行行长哈里·希普曼的弟弟。玛丽和艾瑞克在二战的尾声中相识，历经千辛，才成为合法夫妻。艾瑞克比玛丽年长 9 岁，机智雄辩，才华横溢，交际广博，令玛丽献身于他、并允许他主宰她，直至 25 年后艾瑞克因帕金森综合征自杀。作家安东尼娅·怀特曾说：“艾瑞克·希普曼是我遇到的最了不起的人。”

如果说，海因茨埋下了玛丽文学兴趣的种子，那么艾瑞克就应该是一位种植者。玛丽与艾瑞克之间 25 年的情书，也许就是玛丽笔下工夫的操练；而艾瑞克一生未能如愿轰动文坛的遗憾，也许就是玛丽在丈夫去世后，生活贫困交加，仍旧创作不止的动力，也许，那正是她直至 70 岁高龄出书享誉世界的源泉。



3个男人和前后路过的情人们不仅给玛丽的生命带来了缤纷多彩的愉悦，同时也把她拖入了那些上流社会婚变的闹剧、经典的遗产纷争，以及情敌们与法律的游戏，这些使玛丽练就成一位斗士：与家规世俗斗，与战争死亡斗，与情敌斗，与艰难贫穷斗，与蹂躏真实生活的虚伪写作斗，直至与生命的年轮斗——斗得她内伤外伤，情伤亲伤，伤痕累累！但那斗志昂扬，其乐无穷，皆在她晚年笔尖上的叙述之中：时代丑恶中的高尚，世俗虚伪中的叛逆，上流社会的下流。

从难以计数的令玛丽悲喜交加的评述中可以看出：为什么她引发了欧洲范围内的文学革命，并被誉为了“简·奥斯丁与性爱”。她曾在我们的交谈中，自言自语：为什么人们仅仅看到了她的作品对性爱权益的认知和捍卫，却没有多少人能够看到：那是人类对两次世界大战的感悟——战争使性爱得到释放，甚至无限于伦理道德？那是因为战争摧毁了人们对活着的信念——没有人在身边的炸弹声中坚信自己能够活到明天，也没有人相信任何信仰和戒律能够成为那些枪林弹雨中的护卫甲，于是人们在生死的瞬间把人生一切的愿望都压缩在“任何可能”中实现，而人性中最无限的能量便是性爱。

“女人和战争”不仅是玛丽写作的主题，也是我们之间常常谈论的话题。我有幸走进她的生活，因为她是我的洋婆婆，她的次子，与海因茨的儿子——托笔是我的丈夫。

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拜访她的博根小屋时，午餐后，托笔上楼小憩，我被玛丽邀请留在客厅聊天。此前，我们已在一些文学场合和朋友的家中有过接触，但从未以家人的身份独处。

“托笔怎么定义我的？”玛丽坐在壁炉前的一张维多利亚高背椅上，火光闪烁着她那浑身上下的典雅高贵，令我全然无意她的耄耋之龄，她优雅温和地问我，但口气却不容我回避。

“如实相告么？”我有些无措，但似乎也习惯了她的直率。

“当然。”玛丽的声音很低，但是可落地出坑。

“托笔认为您是他今生最好的朋友，但不是一位他以为的母亲。”



我一字一句报告。

接下来是近半分钟的沉默，而我的大脑内却是一场闪电：88岁的老人受得了这份坦诚么？她为什么不回应？要是她背过气去，我该怎么办？喊救命？打电话？英语该怎么说？

一声长长呼气声后，飘出一声轻了许多的句子：“是一个公平的定论。”玛丽说。

而在那一时刻，我为玛丽感受到了不平：如果，一个女人在几经战争、贫困、耻辱后，还如此在乎儿子们对她定义，那不是一份日夜惦念孩子的母爱么？

那天，我们谈了近5个小时，大多是玛丽在说。事后托笔很好奇地问：“我在楼上听我妈妈说了很长时间，她谈什么谈了那么久？”我告诉他：女人、孩子和战争。

玛丽回忆自己的战争时代时曾说：“战争之所以充满性爱，是因为无时不在的死亡激发了对生命加以确认的强烈需求。英国在遭受着攻击，死亡威胁着城市中的每条街道，两百万年轻人参战，这些都助长了那一需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努力抑制他们自身的欲望，因为那被称之为邪恶，或至少我自己便是如此。在生命中，如果你懂得活着的价值，那么无论怎样的生活都可成为一场宴会。战争使得和平时期公认的尊严与忠诚等规范被暂时悬置起来，有的甚至是本末倒置。”

对于“我们等同一群骚货”，战争期间在“皇家海军女子服务队”服役、后来成为玛丽朋友的杰妮弗尔·默里并不认同玛丽的这一说法。“用‘放荡’这个词描述玛丽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并不合适，”她说道，“我们所有人都一直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因为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杀。玛丽有一次曾对我说：‘在战事交汇处的人们都活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早晨醒来时，要么伸手到枕头那边，想着：这是谁？或是，摸摸自己：我还活着？’”

一战期间，战士们谈论恐惧是懦弱的表现，然而在二战中，将士们开始畅所欲言。玛丽的父亲从未跟她母亲谈起自己战时的恐惧



与疲惫，多年之后却对小女儿坦白承认了这些。但前往波斯肯纳庄园养伤度假的二战飞行员们却很坦率地说出自己的感觉。他们会说：“很抱歉我如此血腥，如此残酷，但我害怕得要命，且明天不得不回到战场上去，可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否活着回来。”事实的确如此恐怖：一万多名英国战斗机飞行员在二战中丧生。在这种情况下，像玛丽·斯温芬勋爵夫人这样的女人本能的冲动反应便是给予他们自己最珍贵的礼物！但这些见义勇为、无私无畏的女人们，却被大逆不道封杀在历史的密档之中；被耻辱埋葬在家族的底层；被黑与白的战争史遗忘在虚伪的尘埃中。

生命中对我们的摧残者也常常是我们个性和坚强的塑造者！

玛丽生命中的野性印记被众多的读者视为是她对自由的追求，而我以为那也是她灵魂中的无畏，自童年的无知无畏，年轻时对上流社会戒律的无畏，战争时的生死无畏，物质生存与精神理想取舍的无畏，为捍卫孩子的权益向家族与社会宣战的无畏，乃至其临终前对自己坦言剖析的无畏。

自我年过半百后，“我是谁”似乎成为我每年的生日祝福。但我知道，我害怕内心的自我：公众前的作家欣然令我微笑着听从虚荣的抑制，而独处的女人欣然却在放任自己对以往痛苦的追忆。

诚实需要信念、意志和知识，而诚实才能使我们放飞真正的自由！

野玛丽以90年的生命历程在世俗中有知无知地追求自由：童年追求女孩对家的自由，追求少女对梦的自由，青春期追求性的自由，成年追求爱的自由，晚年追求写作的自由，终身追求坦诚的自由。而任何自由之所以被后人称之为自由，因为那个自由与其生命所处的时代都是格格不入的。不仅如此，在她的自由信念中，包括着人性中真实和坦诚，但她从没有为了“正名和清白”而出卖朋友和违背战争情报人员的准则。

此书中的玛丽·威斯利仅是一个人们朦胧记忆中的剪影，一个时代叛逆者的剪影，一个人性黑暗中的剪影，她从女性的“被迫、



沉默，以及叹息”中探出自己向往，大胆地呼吸着“男人的空气”，于是，女人黎明前的黑暗，留下了一个“野玛丽”的剪影。

有幸被“野玛丽”的策划人及作者邀请，作为中文版的合著者，与英文版作者、中文版译者共同磋商中英文化、语言的异同，实为一次珍贵的文学实践。由于正值自己新书的英文翻译工作，同时巡游多国，发行、讲学，以及参加一些国际会议，匆忙之中鏖战近14个月。情节感慨处，又常常令我顿笔沉思。潘源女士的中文翻译，文字如此流畅，绝非我能想象，不知如何能感谢她予以我这份奢侈。作者帕特里克·曼汉姆，不愧皇家学术派，擅长广博传记。英国百年远征史，两次世界大战，英国皇室礼节，英国名流轶事，三大家族案件，宗教政治，尽在此书中偶露峥嵘。因此，中文版需要大量补充说明，以便中文读者分享。数稿补充修订后，仍然电话作者及相关人士，追问史料细节。2013年圣诞节前后，又“勒令”玛丽次子，夫君托笔配合，再揭伤疤，确认家族案件详情。届时可见托笔重陷愤慨，竟一时害怕他下厨动刀不能自制。

2014年元旦，花城出版社编审林宋瑜优雅的一声“新年快乐”令我无地自容！她从未挥剑催稿，让我备感天时地利人和。叩谢之余，咬牙跺脚：中国新年前定交稿！但时辰临近，又诚惶诚恐。好在一直学问阿Q求生存，信奉读者宽宏大量，习惯既安定。

感谢分享与共赏！

致中文版读者的一封信

一些中国读者可能认为，西欧上流社会的生活很安逸舒心，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本书中讲述的便是一位来自英格兰上流社会的女子在战争、信仰和生存中所经历的罹难，但她从未放弃自我的追求。

玛丽·威斯利出生在二十世纪初英国一个皇亲国戚的家庭，但她自幼便与那些“上流社会的意识形态和等级制度”相排斥。当她离开她的勋爵丈夫，全身心地爱着作家丈夫时，后者却一次次失业，他们几乎流离失所。她试图以写作谋生，但她所有的故事都被拒绝出版。而在她作家丈夫病痛自杀后，她自己也差点病死，她穷得竟无法给自己的居室供暖。为了熄灭儿子们遗产继承的战火，她冒着坐牢的风险捍卫了弱者一方。

她那叛逆的个性使她自上而下的生活会变得默默无闻，并遭受着接踵而至的失败。为了把自己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她决定写一本“亲身经历的书”：一个孤独的寡妇，挑战着自我绝望，仍然帮助在绝望中的他人。随之而来意想不到的，奇迹发生了！历经30年的失败，直至71岁高龄，这部小说被伦敦的一家出版商接受。玛丽·威斯利开始了新的生活，随后的九部小说使她成为英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

玛丽·威斯利不仅很有魅力，而且才华横溢，慷慨大方，聪明智慧，敏锐幽默。但她的读者并不知道她虚拟小说背后真正的故事——那正是她生命的最后一年说出来的这部传记。

谢谢分享。

帕特里克·曼汉姆

前言

——玛丽·威斯利的“加塞儿”人生

帕特里克·曼汉姆

1970年1月，在英格兰西南部达特姆尔国家公园的一个偏远小屋内，患有帕金森综合症的破落作家艾瑞克·希普曼（Eric Siepmann）昏迷不醒，随后被送往医院，4天后，他去世，验尸结论为“自然死亡”。

艾瑞克·希普曼去世后，除了每月政府发放的遗孀抚恤金50英镑（相当于2011年的1200英镑）^①，并未给妻子玛丽和十几岁的儿子比尔留下任何积蓄和事业的成就。在他们整个婚姻岁月中，艾瑞克一直在写剧本、诗歌、小说和短篇故事，以及评论和大众哲学类文章，但除了一部已被遗忘了的小说和将自己描述为花花公子的回忆录之外，其他长篇都极少完稿，且无一出版。当其生命终结时，可供回首的只有25年“生不逢时，命不逢运”的写作记载。玛丽·希普曼从未上过公学，不具备任教资格，也不善庖厨，为了维持生计，在古董店打零工，并编织毛衣卖给熟人。夏季，她把小屋出租，自己去跟朋友同住。她每月虽有一小笔家族遗产收入，但总是姗姗来迟；每到月末，在领取抚恤金的日期前，玛丽经常无钱购买取暖的燃料甚至邮票。

她一生都在自学写作，尽管屡屡碰壁，但从未放弃。在丈夫去世数月之前，她的两部儿童读物被出版商接受，虽深受好评，但并未赚钱。到了1977年，她完成了第三部著作，涉及孩子与死者的交流，还有一部关于寡妇决定自杀的成人小说，但两部书都被出版商

^① 本书中英磅的历史金额相当于2011年金额的换算，以 economic status value of that income or wealth 为标准。



拒之门外。

玛丽·希普曼的手提包中一直放着一个小日记本，1978年——丈夫去世八年之后——她在封面内侧写道：“别叫醒我！”这个注释成了此后几年新日记本上的铭言。在日记本背面，她记录了撒玛利亚救助会为情绪受困扰和企图自杀的绝望者准备的24小时紧急联络的电话号码。她有3个儿子，但那个圣诞节无人回家探望她。此前见到次子托笔（Toby）时，她曾说：“我已推算过，如果你继续以此频率过来看我，我死前还能见到你两次。”平安夜和新年前夜她都在当地的撒玛利亚救助会值班，倾听别人的自杀想法。

1981年的一天，她的汽车——一辆老式迷你汽车——未能通过年检，她意识到，除非卖掉自己的国家公园景区小屋，搬到城里，否则将无法承担其维修费用，随之便会失去与外界沟通的条件。于是，第二天，她便开始卖房。与此同时，她的文稿代理人来信说，她的小说《加塞儿》和儿童读物《随意之宅》遭到另外6位出版商的拒绝。房子待售之时，玛丽病倒了。她在那个供暖不足的风子里，患上了支气管炎。同年2月，一位想在达特姆尔国家公园景区买房的退役海軍军官来到这个地区看房，走进了开着门的小屋，他在楼上发现了他要找的卖主——一位卧床不起的69岁老妇人。她病得几乎说不出话，但还在挥手示意，让他继续参观小屋。他帮她找到了一个氧气瓶，之后又将妻子带来帮助这位孤独的老人。军官的妻子事后对他人说：若非亲眼所见，她永远不会相信这一情形。

玛丽·希普曼在一个从不抱怨的坚忍之家长大，但那时她的日记却留下了一些抱怨的词汇：

周五：生病。

周六：病重。

周日：病重呓语。

周一：病重（手抖得厉害，字迹不清）。

周四：仍在病中，一生从未如此难受。

周日：被诊断为“曼谷流感（Bangcockflu），病情特殊”。



周一：医生再次造访——“双侧肺炎”。

卧床后 16 天：“体温回到 40 度。”

大病三周后，她终于可以勉强起床穿衣，病情的好转使她避免了过量服药的风险。

如果她的故事到此为止，人们将不会意外于她丧夫之后所经历的不幸。就在她痊愈一星期后，卡拉福德（Cullaford）小屋得以售出，她开始埋头打包，搬到当地的集市小城托特奈斯（Totnes）中心一个小屋中居住。尽管玛丽依恋住了 17 年之久的国家公园景区小屋，但她发现托特奈斯的小城生活很快转移了自己的注意力，这一点她很欣慰。“挤在一间酒吧和一座福音堂之间的狭窄街道上的一所很高的房子里”，在晨间赞美诗与晚上朗诵圣经的相伴中，她开始油漆书架，取出书籍，挂起画像，铺好地毯，更换新床。在纽约居住和工作了 14 年的儿子托笔也搬回了伦敦，开始定期探望她。

“别叫醒我”的字迹从她日记的封面内侧上消失了。

1981 年 7 月，她的文稿经纪人泰莎·塞尔再次就她两部未出版著作《加塞儿》和《随意之宅》写信给她：“我觉得找到愿意出版这两部书的人的机会微乎其微。不过，我很愿意保留手稿，以备遇到具有足够冒险精神勇于一试的出版商。在情况改善之前，我无法承诺会积极主动地提交大作。”此时的玛丽正受着新生活的激励，决定不去理睬这封近乎拒绝履行契约的信。况且事实的确如此，出版社“年轻的职业编辑们”对她这样的无名作者的书并无什么兴趣。康斯特布尔出版社退回《加塞儿》时，做出如下评述：“（我们）从未读到这种无序的写作，无法接受您那贯穿始终的毛骨悚然……”关于《加塞儿》，以前出版过她的一部儿童小说的麦克唐纳德写道：“商业性不足。”爱尔·梅休出版社和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也无动于衷。丹特出版社发现书中人物“离奇得令人难以置信”。这些势不可挡却又模棱两可的评论几乎未为她继续写作留有余地。但玛丽自信她的书自有出色之处。

1981 年 10 月，玛丽去了华盛顿和纽约，其晚年密友凯特·甘兹